

唐石经碑式与中古书册制度关系探微*

侯金满

内容摘要:唐石经碑式改变了汉魏石经“一行直下”的形式,而采用“分层横刻”这一类似于后世刻帖的经文排列形式。结合中古书册制度,碑刻书丹、镌刻流程以及唐石经前身“壁本”形制等影响唐石经碑式形成的诸要素,可以推测唐石经采用“分层横刻”,是为了在不改变传统碑石形制基础上,最大程度保留当时经籍写卷形式,减少书丹和阅读的疲累,是在长幅的中古写卷与直立的碑刻之间作出的折衷,客观上利于拓印后的装裱与流传。同时,始自大历五经壁本的“壁经”传统,可能使得唐石经在安排经文书刻形式时将连成一体 的碑石视作整个宽广的平面,不受单个碑宽的限制,更多考虑经文底本的构成形式,从而采用了以卷为中心,而非以碑为中心的排列方式,因此在“分层横刻”碑式基础上伴生了“跨书”这一独特现象。

关键词:石经碑式 书册制度 分层横刻 跨书 壁经

石经之刊刻肇始于东汉熹平年间,唐开成石经是继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之后,由中央王朝实施汇刻的儒家典籍官方定本。唐石经刊刻时正处于儒家经典传本由写本向刊本转变的关键时期^①,故在经本内容这一层面,被认为居于“古本之终,今本之祖”^②的地位。其实,唐石经在七朝石经中所具有的鲜明的过渡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本内容这一层面,亦体现在其碑式上。唐石经改变了汉魏石经相承的“一行直下”碑式,开启了后蜀、两宋、清各朝石经相承的“横刻”形式,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其碑式中特殊的“跨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13&ZD063)阶段性成果。

① 昌彼得在《唐代图书形制的演变》中指出唐代是我国图书史上古今转变的分水岭(昌彼得:《版本目录学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第123页),而处于这一时期的唐石经在历代石经中亦具有特殊的转折意义。

② 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叙例》,《景刊唐开成石经附贾刻孟子严氏校文》第4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2995页。

现象,可能是继承自唐石经之前身——“壁本”(包括大历土涂壁本和大和新修木板壁本)的书写形式^①,根源在于承袭了汉魏石经传统中的景观性与宣示功能。

有关唐石经碑式之研究,包括其与蜀、宋、清石经共有的“横刻”形式以及其本身特有的“跨书”现象。清代以来,如王昶^②、魏锡曾^③、张国淦^④等人虽有所涉及,但偏于描述,直到马衡始结合碑刻的传拓及装帧技术对唐石经碑式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⑤。近来,王天然《蜀石经形制辨识》在讨论蜀石经形制之时,又进一步引申马衡之说,提出蜀石经“是唐开成石经影响下的帖式刻石”^⑥。此说对唐石经碑式研究富于启发意义,但其研究重点在于蜀石经碑式之复原与成因探究,对唐石经碑式形成的内在原因及其特殊性尚未暇展开深入论述。

因此,本文在综合考察唐石经原石及拓本的基础上,首先梳理、辨析唐石经碑式之“分层横刻”形式与“跨书”现象,其次结合中古书册制度的相关研究,从中古写卷形制、碑刻书丹、镌刻流程以及唐石经前身“壁本”形制等影响唐石经碑式形成的诸要素,深入探究其特殊碑式的内在成因。

一、唐石经碑式中的“分层横刻”与“跨书”

历代石经之中,唐石经“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石经”^⑦。唐石经之

①唐石经与大历壁本五经之间,还有大和木板九经这一过渡阶段,但大和木板九经在当时未被赋予新名,依旧称为“壁本”。故此处“壁本”一词实可兼指唐石经之前的大历壁本与大和新修壁本这两个阶段,此二种“壁本”与唐石经一起构成了唐代“壁经”系列,具体论述详见下文。

②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九《石刻十二经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续修四库全书》第8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5页。

③魏锡曾:《唐开成石经图考》,缪荃孙编《藕香零拾》丛书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29页。

④张国淦:《历代石经考》,贾贵荣辑:《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6-10页。

⑤马衡将唐石经以前汉魏石经碑式称作“一行直下,如寻常刻碑之式”(马衡:《石经词解》,《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214页),本文称汉魏石经碑式为“一行直下”式即从此出。

⑥王天然:《蜀石经形制辨识》,《文史》2019年第3辑,第113-128页。

⑦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284页。

刊刻始于唐文宗大和七年十二月(实为公元834年)^①,刻成于开成二年(837)九月。由于其所刻内容为唐代国子监传授及科举所考的儒家“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②,所以《旧唐书》名之曰“石壁九经”。

历来学者偏重于考察唐石经的经文内容,或梳理其刊刻、迁移过程等史实,较少讨论其碑刻形制,尤其对唐石经碑式缺乏关注。所谓“碑式”^③,较早见于洪适《隶续·碑式》,特指碑版中碑文之排列形式,既包括一碑之内文字行款,又包括各碑碑面整体的形式安排等方面内容。

在总的碑石形制方面,包括唐石经在内的历代石经都采用通行的碑刻形制,即总体由碑座(碑趺)、碑身、碑首(碑额)三部分组成^④。唐石经碑身竖长,每石高215厘米,厚20厘米,宽85-98厘米不等^⑤。唐石经共有114碑,双面刻字,石经主体文字至第226面止,自第226面至227面为刊石年月、衔名、进状等,第228面为空白,总共六十五万余字。此114块唐碑,今分东西两排,各五十七石,依次联排。东侧起为《周易》《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六种,《礼记》后接《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但《九经字样》后空缺多行,不与《左传》相接,空白处现有“嘉庆十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武进陆耀通阳湖董曾臣同观”题名。西侧则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六种,末即刊石年月、衔名、进状等。各经卷末一般以隶书刻此一经字数等。

唐石经在排列时,东西厢均采用首尾衔接、诸碑联排的方式,即东西两侧各57块碑,经文皆先书于正面,57块碑正面依次书毕,然后转到末碑背面,并依次书至首碑背面,故《周易》首碑背面为《九经字样》,《左传》首碑背面为碑石第228面空白。此种联排方式,与汉、蜀石经等在一碑正反面连续刊刻之例不同。因此唐石经除了位于东西两厢末碑的《九经字样》和《尔雅》

①大和七年为公元833年,然其十二月初一为公元834年1月14日,故其动工实始于公元834年,各家多系于公元833年,不确。有关唐石经刊刻始末参见张国淦《历代石经考》等著作,原始史料见《旧唐书》《唐会要》及碑石末所载刻石年月、郑覃《进石经状》等(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七、卷一七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571、4490页;王溥:《唐会要》卷六六,中华书局,1955年,第1162页)。

②见碑石末郑覃《进石经状》及《唐会要》卷六六,第1162页。

③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第383页。

④唐石经碑额今已经被摘除,惟余碑身和碑座。此是后来为加固石经而采取的措施,在早期有关唐石经的记载和照片中尚可见其碑额。碑额实物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尚存数种。

⑤此为西安碑林工作人员所发表最新数据,参见强跃、陈根远:《唐代〈开成石经〉的刊刻与价值》,《文博》2015年第5期,第76页。

外,其他诸经末卷皆与相邻一经首卷共碑(详见后文表2),以此环环相扣,故即便碑石移动,其原本的经序与碑石布局依旧可以通过推排文字的衔接见出大端。

唐石经碑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所采用的“分层横刻”形式及伴生的“跨书”现象。所谓“分层横刻”^①,与汉魏石经迥然有别,而为唐石经以后两宋、清石经所继承^②。唐石经碑身部分,以各碑联排为基础,东西厢各自形成多组高广平面。除了碑末的衔名、进状等文字之外,碑文主体部分的十二经经文以卷为基本单位进行布置,各卷之间以直通碑身上下的空行作为分隔,每卷经文上下平均分为八层,每层由右向左跨碑书刻,每层之间除了空行外,时有隐约的界栏。一卷经文之内,每层行数大致均等,每行字数以10字为准,偶因疏密及经文磨改缘故,出现9字或11字之例。各卷因字数有多寡,故不同卷次的经文每层行数不等。

此种将碑文“分层横刻”的形式,与碑刻通行的“一行直下”式不同,而与后代书法刻帖的布局形式更为接近^③。最早对此加以注意者当属钱大昕,其在跋明人重刻唐《娑罗树碑》时论及唐代“横刻”之碑,提出“唐人碑惟国子学《九经》横刻,取其便于讽诵,此外无横刻也”^④。“一行直下”式常见于包括墓碑、纪事碑等竖长形碑石,后来的书法刻帖为了保持书法长卷底本的原

①钱大昕最早指出唐石经存在“横刻”现象,但未提及其“分层”特征。叶昌炽将“碑版”中与唐石经相类似,非“直书而下”的这种碑式描述为“皆横列,自二、三层逾十餘层不等”。柯昌泗则结合钱大昕语,指明唐石经与《干禄字书碑》等同为“分层横列”的碑式(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六,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6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38页;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九,中华书局,1994年,第516、520页)。但因为当代常使用“列”的“纵列”这一名词义,若使用“横列”命名,易导致误解,故本文以“分层横刻”而非“分层横列”命名唐石经这一特殊碑式

②后蜀石经受唐石经影响,采用“横刻”形式,但据王天然《蜀石经形制辨识》考证,其是“单排布局”,而不分层。其他各朝石经碑式情形,可参考《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中所收录各家考证(虞万里主编:《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

③书法刻帖中单刻帖而用分层形式者甚多,可参考西安碑林所藏宋人摹刻唐代名家墨迹刻石,其代表如颜真卿《争座位稿》刻石,北宋熙宁间据安师文藏真迹摹勒刻石,“帖为横石,宽一百五十二厘米,高八十一厘米,分上下二列(层),上列三十二行,旁加四行,下列三十三行,旁加七行”。拓本见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第15册,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1574页。

④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卷六,第138页。其所谓“此外无横刻也”并不确切,柯昌泗对此已有辨析(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第520页)。

貌,或直接采用长条形的横石,或将竖长形的碑石分为数层来覆刻写卷,此种横长竖短的书写形式是在传统自上而下的书写方式中融入了“旁行”的因素,学者或称之为“帖式刻石”^①。因此,单纯从历代石刻布局形式变迁这一角度来说,唐石经碑式是在常规的竖长形碑石上融入了“旁行”刻法,于是便出现了“分层横刻”这一经典刻石的新形式。但唐石经之“分层横刻”形式又与两宋、清石经等“以一石为起讫”的横刻形式不同,而是以卷为单位,对卷内各碑加以联排,“合各面统为起讫”^②,因此呈现出了唐石经碑式中独特的“跨书”现象。

所谓“跨书”现象,特指唐石经碑刻文字排列中所出现的同一卷之内经文所分各层同时横跨超过一碑的现象。这一现象与“分层横刻”碑式伴生,为唐石经所特见,但一直未为学者重视,直到魏锡曾《唐开成石经图考》始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其言曰:

盖书石时每以一卷均分八列,石之广不容列者,并后石跨书。既于后石前段书毕上列,复于前石后段接书下列。列尽卷尽,界线提写。经之承经,犹卷之承卷,蝉联而下,不可离析。^③

验之石经碑石及整拓,可知魏氏所描述十分精确。但对于未曾亲见原碑者,对此依旧难以有准确认知。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唐石经的“跨书”并非像其他石经或大型碑刻那样一碑碑面全部刻字已毕,因碑文未完,故在另一碑接续的情况,而是一碑之上所分各层中的一层书毕即跨书,故每一卷每一层之内都存在“跨书”情形。由于唐石经每一卷碑文都被平均分为八层,故此处所言同一卷内各层之“跨书”,更具体是指一卷均分的八层由右至左横跨至下一碑乃至下两碑、三碑。魏氏称其为“跨书”,是从书碑人视角命名,对于读碑者来说,此种“跨书”现象则会改变读碑者常规的自上而下、自右向左的阅读习惯。也就是说,读碑者欲连续读完一卷经文,不能依照通常读碑“一行直下”的阅读习惯,而是将联排的数碑视为一个平铺了八幅长卷的整体,先右后左、自上而下,接续阅读。以一卷横跨两碑这一情况为例,读碑者读完第一碑第一层,经文未毕,此时不是接读此碑第二层,而是接读第二碑第一层,第二碑第一层读毕,接读第一碑第二层,第一碑第二层读毕,接读第二碑第二层,以此类推,待读毕第一碑第八层之后,接读第二碑第八层,至此方才读至此卷经文之末。这一情形必须从碑石整体观照方能明了,为此,以下结合作者本人所考察碑林原石及所见石经整拓,取唐石经第一、二碑为制碑图如下:

^①王天然:《蜀石经形制辨识》,第113-128页。

^②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第516页。

^③魏锡曾:《唐开成石经图考》,第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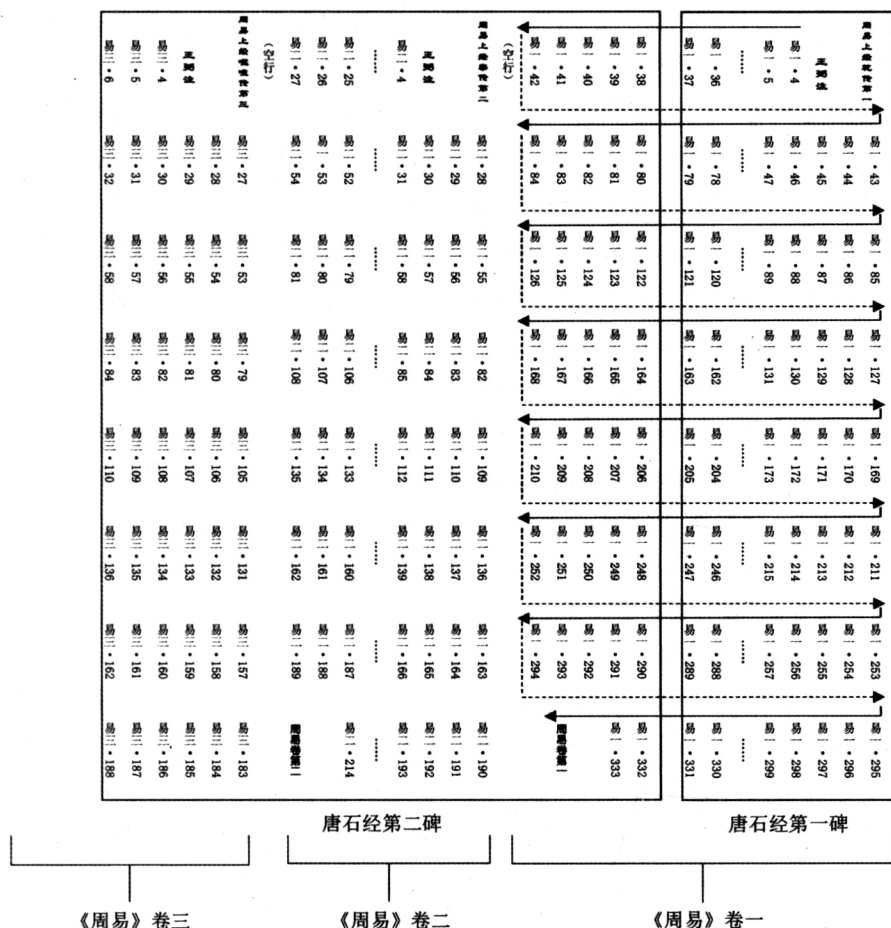


图1 唐石经第一、二碑复原图^①

说明：图中“易一”指《周易》卷一，“易二”指《周易》卷二，“易三”指《周易》卷三，阿拉伯数字指各卷行次。如“易一·4”指“《周易》卷一第4行”。图中实线箭头表示跨书的《周易》卷一经文排列顺序，实线与虚线箭头相连，表示读者读碑顺序。

上图以唐石经首经《周易》为例，取《周易》卷一所在的总第一、二碑。其中《周易》卷一横跨第一、二两碑，卷二不跨碑，是横跨两碑的典型，此类“跨书”两碑的情形在唐石经中颇为常见，其他各经“跨书”情形皆可由此类推。

通过具体调查可见，由于唐石经一碑通常满行为37行，最多不超过39行，因此若某卷字数超过一碑所容最大字数3120字（39行×8层×10字），此

①唐石经各碑碑宽相差不大，满碑以37行为多，少则35行，最多不超过39行。第一碑每层有37行，第二碑为38行，但图1作为跨书示意图，第一碑仅取8行，第二碑为充分显示其所容卷一、卷二、卷三，则取21行，故图1中第一碑明显较第二碑为窄，读者可与唐石经整拓及实物对照，以免误解。

卷必“跨书”，且可能跨三至四碑。相应地，常规情况下，若某卷字数较少，通常不“跨书”，如上所举《周易》卷一经文以每行 10 字为准，共有 335 行，均分八层后每层有 42 行，非一碑所能容，故跨书两碑；《周易》卷二共 216 行，均分八层后每层 27 行，远少于 39 行，故不跨书。但也偶有字数较少的篇目却出现“跨书”现象的情况，如《仪礼》卷十《觐礼》经文正文共 87 行，均分为八层，每层仅有 12 行，如果单纯依据经文字数推断，本无需跨碑，实际却横跨两碑，这是因为其前卷卷九所在之碑尚馀有 4 行可用，刻碑者不欲浪费碑石，故使此字数较少之卷亦横跨二碑。

根据各经每卷字数多少及联排状态，唐石经有一卷横跨两碑、三碑乃至四碑等情况。一卷横跨两碑之例除上所举《周易》卷一之外，另如《周易》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九、卷十，《尚书》卷一、卷四、卷五、卷六、卷七，《毛诗》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等皆是其例；横跨三碑者如《周礼》卷一、卷三、卷四、卷五以及《仪礼》卷五、卷七、卷八、卷十七，《礼记》卷一、卷四、卷七、卷八、卷九等。横跨四碑者较少，如《春秋左氏传》的卷十八、廿一、廿三以及《五经文字》的下卷等。

总体来看，唐石经的“跨书”以一卷之内各层横跨数碑为基础，由卷内延展至卷与卷之间，乃至不同经目之间。因此之故，唐石经的跨书情况，使得其不同经目共碑的现象极为频繁。前已言唐石经十二经并两种字样，除《九经字样》与《尔雅》外，其他各经末卷皆与相邻之经首卷共碑，如《周易》卷末与《尚书》卷首，《尚书》卷末与《诗经》卷首，《诗经》卷末与《周礼》卷首等。而常见的剪裱本开本较小，且一般以经目为单位进行装帧，既无法全面体现整块碑的原貌，亦难以显示原石上多经共碑的情形。清代以来，学者多以剪裱本来研究唐石经，鲜有亲临碑林目验原石者，故往往无法辨明唐石经的“跨书”现象，进而易忽视多经共碑的情况，并因此造成学者对各经所占石数的误估以及相关记载的混乱。

其例如唐石经《尚书》《毛诗》二经相衔接，且前后又皆与他经共碑。赵均《寒山堂金石林时地考》著录为《尚书》十一石、《毛诗》十五石；毕沅《关中金石记》、王朝渠《唐石经考证》、王昶《金石萃编》等均著录为《尚书》十石、《毛诗》十六石^①。然而，《尚书》实际为十一石，为自总第九石至第十九石。

^①诸家著录及辩证可参考张国淦《历代石经考》，惟张氏漏略王朝渠一家，今补入（赵均：《寒山堂金石林时地考》卷下，《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 34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第 503 页；毕沅：《关中金石记》，《丛书集成初编》第 1524 册，中华书局，1985 年，第 69 页；王朝渠《唐石经考证》，《丛书集成初编》第 132 册，中华书局，1985 年，第 9、15 页）。

其中自总第十石至总第十八石全为《尚书》经文,另有卷一与《周易》末卷同在总第九石,卷十三与《毛诗》卷一同在总第十九石。《毛诗》实际为十六石,为自总第十九石至总三十四石,其中自总第二十石至总三十三石完全为《毛诗》经文,另卷一与《尚书》卷十三同在总第十九石,卷二十与《周礼》卷一同在总第三十四石。凡此二经相衔接之碑石,各家或归前经,或归后经,或分属二经,极易淆乱。前人著录存在错误,究其根源,即是各家忽略了唐石经“跨书”现象对各经所占碑数的影响,以剪裱本逆推原石,故导致对原石实际情况误判。直到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始对经与经间首尾共碑现象加以考证,故其著录方能纠前人之失^①。

然而,严可均未曾亲临碑林^②,故其重点在于根据整拓考正经与经间首尾共碑的现象,而未留意唐石经原石上特有的卷内“跨书”现象。直到魏锡曾《唐开成石经图考》发觉王昶等人忽视卷内“跨书”,以至于对唐石经各经所占石数记载存在偏差及疏漏,始对唐石经碑式加以特别注意。

魏锡曾《唐开成石经图考》一书在诸家石经研究著作中体例非常独特,其书以“旁行斜上”的表格形式,根据唐石经每碑经文分层横刻之例,其表格亦从上到下分为八栏,横则分载所见唐石经整拓各幅,每栏内不一一逐录经文,而是注明经文起讫。如此,则使读者在较小篇幅内即可明了唐石经各幅整拓乃至整体碑文排列情况。然而,魏氏此书本为方便无法亲见原碑者而撰作,但是其所据依然为拓片,后人若非亲见原碑,加以勘验,依旧有所隔膜。

作者曾见国家图书馆藏《尚书》整拓一种^③,共十一幅,正对应碑林《尚书》十一石。因原石《尚书》第一石(总第九石)与《周易》末石合,第十一石(总第十九石)与《毛诗》首石合,对应整拓之第一、第十一张即为小幅,与其他九幅大小有别。阅览此种整拓有助于初步了解经与经之间的衔接情形,但对各经一卷之内的“跨书”情形依旧不能明了,此即王朝渠、严可均等人研究存在疏漏的原因所在。今据碑林原石及笔者所见国图整拓,先列为表1《唐石经〈尚书〉跨书调查示例表》,以见一经之内的“跨书”情形;其次则列

①严可均著录曰:“《尚书》凡十一石,其第一石与《周易》合,末石与《毛诗》合。”“《毛诗》凡十六石,其第一石与《尚书》和,末石与《周礼》合。”(严可均:《唐石经校文》,第3010、3020页)

②严可均撰《唐石经校文》时仅根据整拓,并未勘验原石,故其所记亦有疏误,如以《礼记》末石与《左传》合,即大误。其后经魏锡曾、张国淦等辨明。具体参见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叙例》、魏锡曾《唐开成石经图考》及张国淦《历代石经考》等。

③《唐石经尚书》,国家图书馆藏整张原拓,编号:各地1937。

为表2《唐石经诸经石数、字数、拓片纸数统计表》,以见唐石经各经之间“跨书”情形。

表1 唐石经《尚书》跨书调查示例表

卷次	均分八层后 一层总行数 ^①	碑次(自 右至左)	是否 跨书	备注
卷一尧典(含书序)	27(16+11)	9-10	是	卷内跨书,并有二经共碑现象。各列右侧与《周易》末卷相接共石。凡标题大字隶书占两行,故首列标题以两行计。
卷二大禹谟	26	10	否	
卷三禹贡	27	11	否	
卷四汤誓	31(11+20)	11-12	是	卷内跨书
卷五盘庚	36(18+18)	12-13	是	卷内跨书
卷六泰誓	22(20+2)	13-14	是	卷内跨书
卷七洪范	37(35+2)	14-15	是	卷内跨书
卷八康诰	35	15	否	
卷九洛诰	27	16	否	
卷十君奭	34(10+24)	16-17	是	卷内跨书
卷十一周官	25(13+12)	17-18	是	卷内跨书
卷十二毕命	26(25+1)	18-19	是	卷内跨书
卷十三文侯之命	11	19	否	有二经共碑现象,末石与《毛诗》首卷共石,但无卷内跨书现象。

表2 唐石经诸经石数、字数、拓片纸数统计表

经目	石数(跨书者 归前经)	纸数 (张)	字数 (字)	备注
《周易》	9(1-9)	9	24437	《周易》前无跨书,当为东列之首碑
《尚书》	10(9-19)	11	27134	《周易》末卷与《尚书》首卷共碑
《毛诗》	15(19-34)	16	40848	《尚书》末卷与《毛诗》首卷共碑
《周礼》	18(34-52)	19	49516	《毛诗》末卷与《周礼》首卷共碑

①凡加注括号者皆跨书之卷,括号内数字分表示跨书之卷每层“右侧碑石行数+左侧碑石行数”。

(续表)

经目	石数(跨书者 归前经)	纸数 (张)	字数 (字)	备注
《仪礼》	20(52-72)	21	57111	《周礼》末卷与《仪礼》首卷共碑
《礼记》	33(72-105)	34	98994	《仪礼》末卷与《礼记》首卷共碑
《五经文字》	8(105-113)	9	3235	《礼记》末卷与《五经文字》首卷共碑。 又《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字数见二 书序例,为字头数,不含注文。
《九经字样》	1(113-114)	2	422	《五经文字》末卷与《九经字样》共碑, 《九经字样》后无跨碑,当为东列之 末碑。
《左传》	68(115-182)	68	198945	《左传》前无跨书,当为西列之首碑。
《公羊传》	16(182-198)	17	44748	《左传》末卷与《公羊传》共碑
《谷梁传》	16(198-214)	17	42089	《公羊传》末卷与《谷梁传》首卷共碑
《孝经》	1(214-215)	2	2□□3	《谷梁传》末卷与《孝经》共碑。《孝 经》字数相应文字残缺。
《论语》	7(215-222)	8	16509	《孝经》与《论语》首卷共碑
《尔雅》	4(222-226)	5	10791	《论语》末卷与《尔雅》首卷共碑
总字数、衔 名、进状等	1(226-227)	2		《尔雅》末卷与总字数、衔名、进状等 共碑。衔名、进状等跨第 226、227 面, 228 面空白,有后人刻无关文字。
总计	227	240		碑石所记,不计衔名、进状等共 650252 字,《孝经》字数缺,其他诸经 611122 字,计算机所记两种字样合注文 43734,合计 654856 字,已过六十五万 字,其间容有误差。

表 1 是《尚书》一经各卷的“跨书”情形,《尚书》总 13 卷,其“跨书”者即有 8 卷。《尚书》之外,根据碑林调查人员提供数据^①,其他各经《周易》附《略例》总 10 卷,跨书者 7 卷;《诗经》20 卷,跨书者 14 卷;《周礼》12 卷,跨书者 12 卷;《仪礼》17 卷,跨书者 14 卷;《礼记》20 卷,跨书者 20 卷;《五经文字》附《序例》4 卷,跨书者 4 卷;《九经字样》1 卷,跨书者 1 卷;《左传》30 卷,跨书者 30 卷;《公羊传》12 卷,跨书者 11 卷;《谷梁传》12 卷,跨书者 10 卷;《孝经》1 卷,跨书者 1 卷;《论语》附《集解序》11 卷,跨书者 7 卷;《尔雅》附《序》

^①此为作者赴碑林调查资料时,段志凌先生惠予石经各碑“跨书”调查数据,谨致谢忱!

4卷,跨书者3卷。则唐石经碑文总167卷,跨书者142卷,足见唐石经各卷“跨书”现象之频繁。其中如《周礼》《礼记》《左传》《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六种更是卷卷皆跨书,可以说,在整个唐石经各卷文字排列形式上,跨书乃是常态,不跨书反倒是特例。

唐石经之所以出现如此频繁的“跨书”特别是卷内跨书现象,正与其采用独特的以卷为中心的“分层横刻”形式密切相关。在唐石经以前,汉魏石经包括唐碑中的玄宗御注孝经碑^①,均采用“一行直下”式的刊刻方式,并未分层横刻,一碑刻完方刻下一碑,极少出现一卷分属数碑的情况;后来蜀、宋、清各朝石经虽然承袭了唐石经的“横刻”碑式,但无论是否分层,都是以碑石为单位,其分层者每碑刻完一层,即在同碑上刊刻下一层^②,故亦极少出现同卷横跨数碑的现象。可以说,“跨书”现象的前提是以卷为单位的“分层横刻”,而当“分层横刻”以碑为单位时(如两宋、清石经),则不一定导致跨书。结合唐石经诸碑联排的形式可见,唐石经出现跨书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安排经文书刻形式时,以多碑联排的形式将碑石拼接为一个整体,使之成为整个宽广的平面,而非一块块独立的碑石,故刊刻时不受单个碑宽的限制,更多考虑经文底本的结构形式,采用了以卷为中心的排列方式,按照经文卷次加以设计安排。如此,则唐石经以横贯在不同碑石上的各层作为最基础的构成要素,而非以单独的碑石为刻字单位,方出现“一卷多碑”的“跨书”现象。

唐石经改变了此前汉魏石经“一行直下”的碑式,开启了历代儒家石经中“分层横刻”的经文排列形式,在碑式设计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兼之其所刻有两百多面碑,六十馀万字,则刊刻时不仅工程量大,刊刻难度亦非寻常碑刻可比。依照常规的刻碑程序,此种大型组碑在刊刻之前,碑图设计者需首先确定碑数。唐石经的石碑每块碑长基本一致,每一层每行以10字为基准,每碑均有8层,则8层经文纵向合计80字左右。唐石经每碑碑宽亦大体固定,一般横向容纳35-37行,最多不会超过39行。则全碑所容字数通常为2800-2960字左右,一般不超过3120字。唐石经刊刻时有纸本经文作为依托,故每卷经文字数为已知数^③,而碑文主体仅刻经文正文,字体大小基本一致,因此碑式设计者只要以卷为单位分层合刻,结合每碑固定的字数,即

①唐石经刊刻之前,玄宗御注孝经碑等亦采用“一行直下”式,此碑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②蜀石经为单层横刻形式,正面一层刻毕,转入背面接刻,亦无“跨书”,具体情形详见前举王天然《蜀石经形制辨识》考证。

③唐石经每部经文末尾皆以隶书注明该部经文卷数及总字数,可知碑图设计者及刻工详细统计过正文字数。

容易确定每卷经文所需碑数,及是否需要在卷内跨书、或多卷共碑。今察碑石末载郑覃等《进石经状》,所上除“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壹佰伍拾口《字样》肆卷”外,尚有“石经图壹轴”^①,或即是唐石经碑式的设计图。而对于我们后世读者而言,在未见石经原碑的情况下,也可以依据经文字数来大致判断一卷经文是否跨书——若一卷字数超过 2880 字,则基本可以肯定其存在跨书情况。若一卷字数少于 2880 字,则可能需要根据上下卷的情况,及卷与卷之间的衔接情形来综合考虑。

二、从纸本到石本——中古书册制度对唐石经碑式之潜在影响

如上文所述,“分层横刻”的形式实际上是在传统“一行直下”的书写传统中加入“旁行”的因素,而“旁行”不仅是后来书法刻帖的典型碑式,更是当时用于写经的长幅写卷的常规格式。因此,唐石经碑式的形成很可能受到了中古书册制度的潜在影响。此下本文即从书册制度这一角度,推考唐石经刊刻时所据经典底本与刊刻后流传拓本的装帧形式、文字行款等,以探究唐石经碑式之成因。

有关历代书册制度,根据出土实物及学者研究可知,直到秦汉时期,犹是竹帛并行的状态。至于唐石经所处的中古时代,纸张早已代替简帛成为主流的书写载体,文献主要以写本形式存在,雕版虽已出现却应用不广^②。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中古时代写本以卷轴装最为常见,《唐六典》记载唐代宫廷藏四部典籍形制,特别提到朝廷藏书基本上是卷轴装:

集贤所写,皆御本也……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籤,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籤,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籤,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籤,以为分别。^③

唐石经作为当时中央朝廷确定的儒家经典官方定本,据《册府元龟》所载,其

①参见碑林原碑第 227 面,碑石已残泐。另国家图书馆藏有此石拓片,题“开成石经敕文并职名”,编号:各地 6970。

②雕版出现之后,刻本要经过相当长时期才逐渐超过写卷在当世书籍中的比重,直到明代《文渊阁书目》尚是“钹板十三,钞本十七”。对此最新研究可参考马楠:《陈振孙藏书之钞本考》,《文史》2017 年第 3 辑,第 105-108 页。

③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九,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80 页。

所据底本为宫廷或国子监所藏经典写本,而且刊刻前复经集贤院等校勘^①,据上文所引《唐六典》,可知集贤院所写“御本”正是卷轴装,则唐石经所据底本装帧形式当即卷轴装无疑。至于这些卷轴装的经典写卷的具体行款等形式,今人可通过现存敦煌及日本所藏群经写本残卷实物获得直观认识^②。将其与唐石经经文书写形式比较,可以见出其中至少四个方面的联系。

其一,在经本形态方面,今见敦煌及日本所存唐代群经写本普遍为经注本,白文本甚少^③,唐石经亦以经注本为底本。唐石经中除所附录的两种《字样》有双行小注外,各经皆无注文,由此可能会造成唐石经以白文本为底本的误解。实际上,唐石经底本亦为经注本,亦即为蜀石经所依据之“大和本”^④,只是唐石经在刊刻时,可能考虑到经传注一并刊刻工程量过大,故削去了传注而已。唐石经虽然删去传注,但在碑文上依然保留了一定痕迹,首先是各经卷首皆标明笺注之人,如《仪礼》卷首标明“郑氏注”(见图2);其次为经文之外又保留传注之序、例,如《周易》附王弼《略例》,《尚书》有孔序,《春秋三传》皆有杜预、何休、范宁之序等。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即指出:“其题王弼注而实有经无注者,明此用王注本,故标王以别众家,他经放此。”^⑤此外,经本卷次可以反映底本来源,不同的卷次分合代表了不同的家派。取唐石经各经卷次与《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各经传本卷次分合情形对照可知,唐石经中各经经文分卷正与其所据经注本相合,如《周易》十卷即王弼、韩康伯本,《尚书》十三卷即梅颐所上孔安国本,《毛诗》二十卷即毛传郑

①《册府元龟》:“初,文宗诏国子监九经石本,所司校勘,尚有舛误,传于永久,必在精详,宜令率更令韩泉充详定石经官,就集贤院校勘,仍旋送国子监上石。”(王钦若等撰,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学校部·刊校》,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册,第7018页)

②相关论述可参见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7页;施安昌:《敦煌石室发现的四种碑刻古拓——兼谈中国书籍制度的变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3期,第71-75页;李致忠:《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文献》2004年第2期,第75-97页;方广锬:《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文献》2018年第1期,第14-22页。

③可参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所收各经经本的具体情况(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2008年)。

④关于孟蜀石经据“大和本”上石,参见王应麟《玉海·艺文》“唐石经·后唐九经刻板”条(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404-405页)。亦可参考王天然:《孟蜀石经性质初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2期,第65-70页。

⑤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卷一,第2996页。

笺本等等。

其二,唐石经的卷首标题、卷末题记形式与中古时期写卷特征相合。中古时期写卷通行“大题在下”之形式,如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就说到“《毛诗》,故大题在下。案马融、卢植、郑玄注三礼,并大题在下”^①,钱大昕据此亦指出“唐刻石经皆大题在下。如《诗经》卷首,‘《周南诂训传第一》’列于上,‘《毛诗》’两字列于此行之下,所谓大题在下也”,唐石经依旧保留了六朝隋唐经本写卷的这一标题形式,而在后来的刻本时代,这一形式逐渐消亡^②。至于卷末,今见敦煌及日本写卷多标明字数及书写题记,并有尾题与首题相照应^③,唐石经亦不但于各经之末标明字数,于碑石之末(第226面碑)书写题记,同时亦具有鲜明的首题与尾题相对应特征,此当是保留了卷子的形式,后来以唐石经为底本的“五代监本”亦继承了这一做法^④。

其三,唐石经的碑式与中古写本界栏形式和纸幅形制存在密切联系。唐石经碑石之上,以卷为基本单位分为八层,各层上下可以见到有隐约的界栏。尤其是乾符及后梁所补刻数碑,其界栏刻线更为明显(见图2)^⑤。今见敦煌及日本写卷中普遍出现界栏,可知是中古时期写卷的普遍特征。唐石经的界栏形态应该是经文底本卷子形制之反映。今知南宋石经亦有界栏,正与唐石经有一脉相承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唐石经界栏之设计与普通碑刻的行格不同,一是唐石经只有界栏,而无行格,二是其界栏规划与“跨书”相配合,亦是以为卷为单位,而非以碑为单位。如《仪礼》卷十一与卷十同碑,卷十跨书,可以明显看到在“仪礼卷第十一”右侧有两道竖长的界栏,以区分前后两卷(见图3)。纸幅形制方面,唐石经经文每碑八层,一层之宽度与写卷或拓本纸张一幅之宽度相应,今据实测唐石经每层约高29-30cm,正与唐

①陆德明撰,黄焯汇校,黄延祖重辑:《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119页。

②即钱大昕所云“宋、元以来刻本,皆移大题于上,而古式遂亡”(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余录》卷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405页)。

③藤枝晃著,徐庆全、李树清译,荣新江校:《敦煌写本概述》,《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2页。

④《古逸丛书》覆刻本《宋蜀大字本尔雅》被认为存留有五代监本旧貌,相关研究可参考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9-56页。按,此本书末题记标明经、注字数,并书字人姓名官衔等,与唐石经在体例上如出一辙,两者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很可能是监本对唐石经之继承。

⑤唐石经碑石上界栏,通常并不十分明晰,而常规剪裱本又往往没于边界,无法呈现,故不及整拓本。本文所据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整拓本。

代官府文书标准式样纸宽度为1尺相应^①。如此唐石经碑石一石所分八层正可以唐纸各幅接续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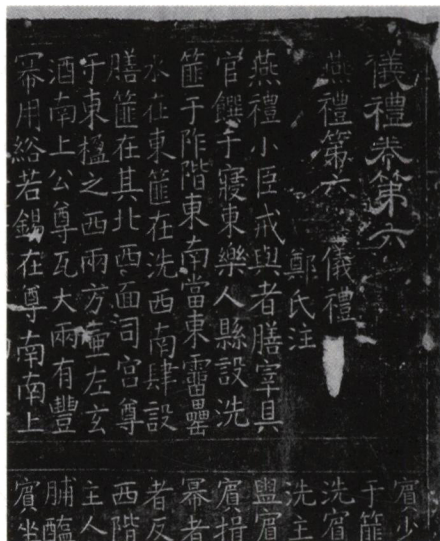


图2 乾符补刻《仪礼》卷六
卷首界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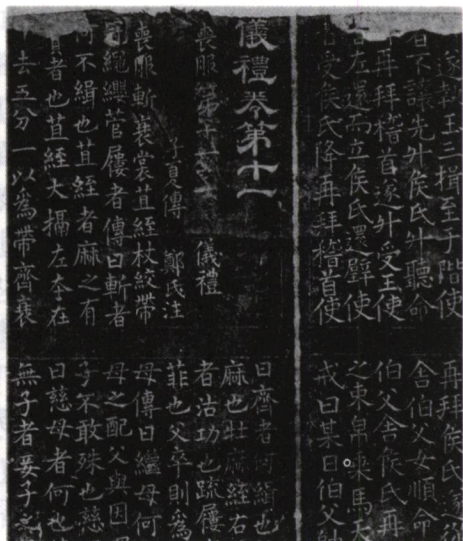


图3 唐石经《仪礼》卷十与
卷十一首层界栏

其四,唐石经书写格式中的某些独特之处,可以在今存中古写卷中得到印证。如唐石经所刊诸经,卷首皆保留有该经传注者大序,且位于首篇之前,而卷首皆不注明卷目,仅在此卷卷末尾题标注卷目。这一特殊现象可能是经传合编后传注附属地位的遗存表现,在汉魏石经等其他经典刻石中未见其例,但在中古写卷如日本金泽文库所藏经注本《春秋经传集解》中发现同类现象^②——此本亦是以传注者大序居首篇之前,而卷首无卷目,但卷末却有尾题,亦可见出唐石经与中古经籍写卷之间的特殊关联。

综上可见,唐石经刻石在将底本为写卷形式的经文逐录到碑石上时,确实保留了唐代写卷的诸多形式。考虑到唐石经刊刻所据底本出自国子监及

^①可参考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以及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等有关唐代纸幅的研究。王天然《蜀石经形制辨识》考得蜀石经单排高30cm,与唐石经亦十分接近(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书册装潢考》,第4-18页;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第102页;王天然:《蜀石经形制辨识》,第125页)。

^②此卷子为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作为所用《春秋经传集解》底本,虽是文永四至五年(1267-1268)写,但据竹添光鸿等考乃出自唐写本(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卷首,巴蜀书社,2006年,第1页)。图版可参看“宫内厅书陵部收藏汉籍集览”网站,网址: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06680。

集贤院藏经籍写卷,则其在刊刻时借鉴中古写卷形制本是十分自然之举。如此一来,中古书册制度便可能对唐石经碑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唐石经碑式中不同于汉魏石经的“分层横刻”形式。

唐石经为何不采用典型的“一行直下”形式,而采用了这一与写卷相似的横刻形式呢?钱大昕最早提出是“便于讽诵”,可能是考虑到唐石经刊刻时的实用目的,即以石刻形式确定经书标准本,立碑于国子监,便于士子观摩、学习。以阅读者视角来看,唐石经对经籍写卷形式的借鉴不仅使得读碑有如读书,而且使得各经每卷卷首标题皆在碑石第一层,有如增加了有序的书签,极便检阅。

除此之外,唐石经碑式的这一改变很可能与其刊刻中的“书丹”环节有关。与唐代碑刻常规刊刻流程相同,唐石经在刻立前亦经过“书丹”这一步骤,所谓“书丹”,是指碑石镌刻前由书碑人先以朱砂书字于碑,其后由石工依此开雕。朱家潜《碑帖浅说》云:

碑式方形者为少,盖低者七八尺,高者或数丈。通行直下,书丹势所不能,仍必分段横排接写。读者仰观俯察,不胜其劳。及至目眩每有失其所在之苦。^①

正如前文所述,唐石经每面近 3000 字,纵向约 80 字,若采用传统碑刻一行直下的格式,对于书丹者和读碑者均极为不便。事实上,汉魏石经碑石皆十分高大,如汉石经据后人考定各碑高达 2 米,行 70 馀字^②,也存在类似书丹上的困难,但汉魏石经所采用的依旧是传统的一行直下式碑式。而到了隋唐时期,长幅的卷子成为通行的书籍形式,时人开始借鉴卷子形式,对传统碑式加以变革,以横石为载体进行书丹、刊刻、传拓。其例如房山石经的碑石多为横石,敦煌所出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原石亦是“横石,共十二块,每石约 98 厘米”^③,1986 年西安出土的柳公权书《回元观钟楼铭》碑石“宽一百二十四厘米,高六十厘米”^④,亦是横石。人们采用这种横长竖短的长条形碑

①朱家潜:《碑帖浅说》,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碑帖的鉴定与考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 年,第 7 页。

②汉石经碑高,《洛阳记》载“高一丈许”,魏石经碑高,据《水经注》载“高八尺”,后人据残石复有考定,具体情形可参考虞万里主编:《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所收王国维等各家复原汉魏石经文章。

③施安昌:《敦煌石室发现的四种碑刻古拓——兼谈中国书籍制度的变迁》,第 73 页。

④柳公权书《回元观钟楼铭》拓本,见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第 20 卷,第 2105 页。按,此碑正刻于开成元年,《金刚经》及房山石经中偶然的分层碑刻时间亦是在唐文宗时代前后。

石,应即是为免书丹、传拓、阅读时的辛劳。

唐石经在刊刻时同样也有改革传统碑式的需要,但限于种种客观因素,其改革的方向不能是采用横石进行刊刻。首先,横石往往形制短小,一石仅可容纳数百字,如前述柳公权所书五千餘字的《金刚经》即需要十二块横碑。房山石经的刊刻则是持续性的文化活动,其刊刻期间,或者将一种大部头经典分多年刊刻而成,或者短时间内仅刻若干篇幅短小的经典,更有数年中断不刻的情况^①,故自可采用小块横石这一形式。而唐石经是在4年内完成60餘万字的刊刻,若采用横石为载体,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对碑石的数量有极大需求,另一方面碑石过多,极易序次混乱,故唐石经采用此种碑式进行刊刻并不现实。

此外,朝廷刊刻石经的目的通常是确定儒家经典定本,作为王朝一代巨典,开成石经亦沿袭历代石经传统,强调中央朝廷的权威性。小块的横石格局偏狭,缺少传统竖长形丰碑的“景观”宣示作用^②,因此唐石经在刊刻时自然不便于采用此种长条形的横石,依旧沿袭了汉魏石经竖长形碑石的传统。

唐石经无法采用横石,但不妨碍其在碑式设计上接受写卷形式的影响。唐石经所采用的“分层横刻”这一形式即是在“横石”与“竖石”之间作出的折衷,是以传统碑刻的“竖石”形式为基础,以“横石”为媒介,参考了写卷的长卷形式。对唐石经这种经文字数众多,书丹及阅读辛劳,但又不便取用横石的碑刻来说,在竖长形的丰碑之上采用“分层横刻”形式,有如将数块横石组合为一大型竖石,既保证了碑刻之取材便利、排列有序与景观宣示意义,又减少了书丹、阅读之疲累,兼此二美,故为后来的各朝石经所继承。

此外,唐石经分层横刻的碑式,客观上来说,使其刊刻之后的拓印流传亦十分方便。这主要与碑帖拓本装裱时对拓片的处理方式有关,马衡在解释唐石经以下历代石经沿袭横刻形式的原因时谈到“唐以后既知传拓,将拓本分列剪裁,即可装成卷子本,取其便于应用也”^③,即是出于这一角度。

①有关房山石经历年造经数量的分析,可参考赵超:《房山云居寺石经唐代题记研究》,《锲而不舍: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三晋出版社,2015年。有关房山石经隋唐刻经经目等可参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石经·隋唐刻经》,华夏出版社,2000年。

②传统碑刻研究中,往往重视碑刻史料与书法价值,现代研究中开始重视碑刻的“纪念碑性”以及文化与政治方面的象征意义,这一层面的意义有时甚至超越其碑文的价值。相关研究可参考巫鸿:《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程章灿:《汉唐石刻:中国式的纪念与记忆》,《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2期,第97-104页。

③马衡:《石经词解》,第214页。

今唐石经唐宋旧拓早已不存,所存最早者即为明万历以后拓本,此类拓本除整拓外,多为册叶装的剪裱本。但考虑到唐代书册以卷轴装为大宗,又《旧唐书》所载郑覃进上首份石经拓本即以卷为单位,则唐石经刻石以后传拓之时很可能仍以卷轴装形式进行装帧,而非今日常见的册叶形式。但无论是卷轴还是册叶,其装裱形式,通常都有整纸裱、剪条裱、剪字裱等方式。

在这三种装裱形式中,显然整纸裱最不费工夫,而剪条、剪字则比较麻烦。尤其是如果原碑文字众多,剪条、剪字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整纸裱的话,由于唐代单幅纸面的宽度限制,如前所言,唐纸标准式样每张纸宽度为1尺^①,对原碑的行款,特别是每行字数有要求。如敦煌所出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之所以能采用整纸裱,就是因为原碑为十二块长条形横石,总长464行,而每行仅为11字,故可直接将若干纸张横向粘联,以卷轴装裱,其间无须频繁剪纸或剪字^②。

柳公权书《金刚经》卷轴装拓本,其时代正与唐石经相去不远,可以想象唐石经当时可能采用与此相同的装裱方式。唐石经采用“分层横刻”形式,利于人们根据碑式,自然分割碑文,使用整纸裱的方式,将八幅拓片粘接,形成一轴类似于写卷一般的卷轴装拓本,不必像常规碑刻一般进行大量剪条、拼字的繁琐工作。设想如果唐石经亦采用汉魏碑刻,或此前玄宗御书《孝经》碑的“一行直下”式,则二百馀面碑皆装成每行十字左右的卷册,不知需要经过多少次剪贴,而且其中更会出现文字错乱的问题。就这一层面而言,今日唐石经拓本普遍采用的剪裱本装帧,反不如其早期流行的卷轴装这一形式便利。

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唐石经碑式虽然受到中古写卷形式的深刻影响,但毕竟与后世为保持书迹原貌而摹勒上石的“刻帖”不同,在由纸本到石本转换的过程中,唐石经不会原样保留唐代写卷的全部面貌,而会根据书写载体的材质、尺寸、用途,对书写形式加以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行款及字体大小等方面。例如唐石经每层每行通常为10字,偶有9或11字。与今见敦煌卷子及日本所存经典写本书写格式相比^③,唐石经每行文字更少,字体更大,与横刻碑中的柳公权书《金刚经》等更为接近,而和写卷差异较大。唐

①古代纸张的长度往往也有限制,但是在进行整纸裱时,可以将若干纸张加以黏连,因此整纸裱更多考虑纸张宽度的限制,而不必在意长度。

②施安昌:《敦煌石室发现的四种碑刻古拓——兼谈中国书籍制度的变迁》,第73页。

③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5页。赵彦卫《云麓漫钞》载宋代:“试童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其以十七字为行,与敦煌所出佛教经典写卷同,可备参考(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49页)。

石经在刊刻时做这样的调整,推测一方面是刻字与写字对技术的要求不同,另一方面则应是为了使碑文字大疏朗,便于观览。由这一方面来看,唐石经碑式的成因并不单一,在中古写卷形式之外,尚有汉魏以来强大的碑刻传统。唐石经最终呈现出来的碑刻形式是碑刻传统与写卷传统两方力量综合的结果。

以上所言中古书册制度对唐石经碑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分层横刻”方面,前已尝言,“跨书”现象与“分层横刻”形式相伴生,但“分层横刻”未必导致“跨书”现象。“跨书”现象之所以产生,应当有其它与唐石经相关的特殊因素。以下即尝试结合唐石经的历史沿革,来进一步探讨其碑式中“跨书”现象之成因。

三、从壁本到石本——唐石经碑式对大历“五经壁本”的继承

前文提及,唐石经在采用“分层横刻”时伴生了“跨书”这一独特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唐石经碑式设计者在安排经文书刻形式时是将连成一体的碑石视作整个宽广的平面,而非一块块独立的碑石,故不受单个碑宽的限制,更多考虑经文底本的构成形式,从而采用了以卷为中心,而非以碑为中心的排列方式。唐石经这一独特取向与其他各朝石经迥然有别,而可能是对其前身——“壁本”(包括大历壁本与大和新修壁本)的直接继承,这一独特的历史渊源可能是导致唐石经出现“跨书”这一特殊碑式的关键所在。

与其他各朝石经相同,唐石经的刊立经历了从纸本(或简本)到石本的过程。但是,在唐石经刊立之前,它所依据的底本,亦即唐代儒家经典的官方定本,早在唐前期,就已由张参书于国子监论堂两厢屋壁之上,即所谓“太学壁经”。其后以屋壁易污,大和初遂代之以木板,是谓大和“新修五经壁本”^①。及至大和七年,朝廷欲仿“汉魏故事”,由国子监刊立“太学石经”,成于开成二年,故又名“开成石经”。由土涂而后木板,最终又代之以碑石,唐代国学“壁经”之演进方告成功^②。事实上,在《旧唐书·文宗纪》和《郑覃传》中,唐石经正被称作“石壁九经”,可以说,唐石经与前两种“壁本”同属唐代“壁经”系列,也是对其前“壁本”的替代,三者之间只是材质不同而已。

①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1-192页。张参:《五经文字序例》,见石经原石及《景刊唐开成石经附贾刻孟子严氏校文》第4册,第2728页。“太学壁经”“太学石经”之名见《文苑英华》所收《太学壁经赋》《太学石经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一八〇,中华书局,1956年)。

②以上关于五经壁本至唐石经的刊刻过程,已经于大成、路远等前辈梳理(于大成:《谈唐石经》,虞万里主编:《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第1071页;路远:《唐国学五经壁本考——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文博》1997年第2期,第39-42页)。

又文宗时曾任宰相的王涯在《太学创置石经》诗中描述石经道：“银钩互交映，石壁靡尘翳。”^①同时期的王履贞《太学创置石经赋》亦描述道：“削成岂劳于执简，壁立更逾于散帙。”^②时人以“石壁”“壁立”称谓唐石经，亦反映出唐石经与其先导大历五经壁本和大和木板九经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虽然壁本、木版原物早已不存，其具体面貌难得其详，但依据当时留下的一些珍贵的文献记载，参以古代题壁书、壁画的情况，可对其形制加以推断。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记载大历壁经之情形曰：

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揭揭高悬，积六十岁，崩剥污蔑，泮然不鲜。^③

从中可见，大历五经壁本最初由国子司业张参书于国子监论堂庭中的东西厢墙壁上，根据文宗时人舒元舆《问国学记》所载国子学建筑布局^④，可知其所立之处正是后来唐石经刊成时所在之处。书群经于屋壁，正如王履贞《太学壁经赋》所言，是“瞻彼垣墙，代兹简牋”^⑤。同时，参照唐五代时常将律令格式等书于官廨公厅之壁以备内外官员“俯仰观瞻，使免遗忘”之例^⑥，可知“壁书”经典或官书在当时应当颇为习见。

大历五经壁书的具体形态，现在从文献和实物上无法得到确证，但考虑到其书写载体是连成一体的房屋整块墙壁，壁经经文行数不会较多受到载体宽度的影响，则在从纸本到壁本的转换过程中，书壁者事实上可以将墙壁作为一张足够宽广的纸张。纸本书写往往用长卷，可以推测，壁本有可能亦使用类似于长卷的连续横书的形式^⑦。而从出土壁画、题壁书及近世尚存的

①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一八〇，第2册，第883页。

②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一，第1册，第276页。

③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第191页。

④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七二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7492页。

⑤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一，第1册，第276页。

⑥可参《全唐文》所收录后唐明宗《录写律令格式六典诏》、王郁《请令诸司各详令式奏》、刘蒙《请石刻准勘节目奏》等。此即蔡副全《论题壁书》所分题壁书之“律令题壁”一类（蔡副全：《论题壁书》，《中国书法》2010年第5期，第44-45页）。

⑦古代壁书由于材质缘故，极少留存，但据今见出土实物，几乎都采用横长竖短的横排形式，与碑石竖长横短的形制相异。如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长222、宽48厘米”，四周并有墨线栏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5期，第15页；另图版参见《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所附，《文物》2005年第5期，第41页）。又古代文献记载题壁书甚多，多有学者梳理，可参侯开嘉：《题壁书法兴废史述》，《中国书法史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90页。

题壁诗文的实例中可以见出,包括唐代在内的各时期以墓室或石窟之墙壁为载体的壁画与“壁书”,不少采用了连续横书的形式,而出土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陕西三原县唐李寿墓的壁画等,为了使长幅画卷与高广墙壁两种载体相适应,更是采用了分(栏)层横画的形式^①。我们据此推测大历五经壁书采用横书,乃至分层横书,也是比较合理的。

此外,考虑到书壁的实际操作,也可以推测壁本可能采用了横书乃至分层横书的形式。壁书在书写经文时,如果依照常规书写的一行直下式,墙壁高处过人首,低处可至人足,书写者每写一行,先仰首,后俯身,如此一行行写去,定然十分辛劳^②。何况张参所书壁本“经典之文六十馀万”^③,若采用分层书写,则不仅辛劳立减,而且效率极高。实际上,今见《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已将法条正文与法令解释文字区分,采用分两层横书的形式^④,可见早在汉代,人们在壁书时就已自觉采用了这一适合于墙壁的书写格式。

而由于大历壁本在存世六十年之后污坏严重,故唐文宗大和初年,以木代土,出现了大和木板九经,即“国学新修五经壁”本。其具体情形,刘禹锡记曰:

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以羨羸再新壁书。惩前土涂不克以寿,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其平如粉泽而洁滑。背施阴关,使众如一。附离之际,无迹而寻。堂皇靚深,两庑相照。申命国子能通法书者,分章揆日,迓其业而缮写焉。笔削既成,雠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飞动。^⑤

根据这一记载可见,木板九经可视为大历五经壁本的替代物。改为木板的新修五经壁本已经不再如大历壁经一般是整个一块墙壁,但它在形制安排

①墓室壁画中采用分栏者,汉魏至隋唐,不乏其例,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对此有专门归纳(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37-154页)。

②此点亦可参照碑刻之“书丹”,如蔡副全所论,碑刻镌刻前的“书丹”大多数就是“题壁书”(蔡副全:《论题壁书》,第51页)。但碑刻尚可先书丹刻石再立碑,而壁书则无此便利。

③张参:《五经文字序例》,《景刊唐开成石经附贾刻孟子严氏校文》第4册,第2728页。

④《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分层,与唐石经及后世刻帖分层不完全相同。其一行之内上下两层文意接续,但若下层一行不足书,并不于次行上层的行首接书,而是于次行下层接书,次行上层则留白,颇似今日上下两栏的表格形式。此种分层形式与后世典型的“分层横书”形式不同,但亦有别于当日简册通行的“一行直下”式。

⑤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第191-192页。

上,却极力向大历壁经靠拢,即“皆施阴关,使众如一,附离之际,无迹可寻”,且“负墉而比之”,可见木板九经是将各版联合如一而贴合于垣墙,有如以木板为材质的墙壁一般。同时,此木板九经亦非刻字,而是书字,所谓“白黑彬斑”,亦与壁经同。正如刘禹锡所说,木板九经是“再新壁书”的产物,则其内容应基本一致,经文书写方式可能也大致相同。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木板九经即便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编排如一,毕竟木板与木板之间并非天然连成一块,而是组合而成,中间尚有细小的缝隙,如此则原本不太受宽度限制、也无所谓“跨书”现象的壁经经文,到了木板九经中,就会出现木板与木板之间的“跨书”现象。既而到以碑版与碑版联排刊刻唐石经时,如果整个版面布局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就自然演变成了本篇所讨论的每卷各层“跨书”现象。因此,从大历壁本到开成石经,随着材质的改变,“跨书”现象将一步步从无到有、从隐微到明显地表现出来。

以上,本文探讨了五经壁本以及九经木板可能存在“横书”乃至“分层横书”的传统,这一传统可能是唐石经“分层横刻”另一源头。如果这一推断成立,则唐石经独特的“跨书”现象则是书写载体由墙壁至木板、石碑转换时,一步步自然衍生的现象。

由此,则可以重思马衡对唐石经采用“分层横刻”碑式之成因的推测。马衡认为,这一碑式是为了方便石经刻成之后拓印装裱。以今观之,这一解释不免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如果唐石经分层横刻的碑式早在大历壁本时已出现,由于壁本、木本二种载体的“壁经”都是以笔墨书写而成,而非金石契刻,故其本身就无法传拓,自然不会是为了修成之后的传拓而如此设计。当然,唐石经刊刻之后,确实可以利用业已成熟的传拓技术,则唐石经经本可以不断翻拓,流传久远,但这一考虑终非决定其碑式设计的前提条件。

四、余论

综合以上的考察可见,唐石经中的分层横刻碑式、及与之伴生的“跨书”现象,保留了其所据唐代经籍写卷底本的特征,体现了唐石经在从纸本向石本转换过程中所受到的中古时期书册制度的影响。同时,通过考察唐石经的前身——“壁本”(包括大历壁本和大和新修壁本),可知唐代“壁经”传统中可能存在“横书”乃至“分层横书”的形式,由此推测,中古书册制度可能亦通过唐代“壁经”的传统而对唐石经产生影响。而在从墙壁到木板、石碑的书写载体转换过程中,又衍生了唐石经特有的“跨书”现象。

总览历代石经,唐石经中的分层横刻碑式以及独特的跨书现象亦显示了其在汉魏石经与后蜀、两宋、清石经之间承上启下的过渡特征。唐石经碑式变革了汉魏石经的“一行直下”式碑式,开启了后来各朝石经的“横刻”形

式,但较以此下各朝石经,唐石经由于其联排的特征,及其受到中古写卷形式的影响,导致其“横刻”是以卷为中心,而非以碑中心。

从文本的书写格式上来看,唐石经亦体现了简册向写本的过渡性,其所采用的“分层横刻”形式实际上是在传统“直行”的书写传统中加入“旁行”的因素,是在长幅的中古写卷与直立的碑刻二者之间作出的折衷,只是书册制度的这一转变反映到石刻文献上要比书籍滞后许多。石经,这一刻在石头上的书籍,不仅其经文与传世典籍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在其形制上亦有复杂的内在关系。由此重新思考石刻文献与书册制度之间的关系,作者注意到,方广钊先生在《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中提出:

装帧问题与书写载体是否可移动相关,对于不可移动的文献,则不存在载体的装帧问题,而只存在如何指示所刻画文献的阅读次序的问题。^①

此说很有洞察力,但是对石经来说,其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书籍,虽然不可移动,但因为其与中古时期书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我们也要考虑如碑版文字如何安排可以更贴合底本所据书籍原貌,以及什么样的碑式会带给读碑者更好的阅读体验等问题,如此则不可移动的碑刻在“阅读次序”之外,也存在讨论“装帧问题”的必要性。

从这一层面来说,唐石经之本质即是以碑石为载体的中古儒家经典文献,是以石刻形式保留下来的中古写卷。正如程章灿教授所论:“石刻和书籍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献,彼此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超越书籍史,就是打破书籍与简帛、石刻以及各种写本文献的界限,将其作为文献的一种”^②。通过考察唐石经碑式与中古时代书册制度的关系,不仅对探究唐石经碑式中独特的“分层横刻”与“跨书”现象有所帮助,对中古书册制度的研究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侯金满,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中国经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经学史及经学文献学。

^①方广钊:《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第14页。

^②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文献》2020年第4期,第9、15页。